

北 大 教 授 主 讲

毛泽东思想专题讲座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组编

主编 陈占安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思想专题讲座/陈占安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8

ISBN 7-301-04611-1

I. 毛… II. 陈… III. 毛泽东思想-研究 IV. A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4172 号

书 名: 毛泽东思想专题讲座

著作责任者: 陈占安 主编

责任编辑: 刘金海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611-1/A · 0022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7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印 者: 北京银祥福利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1.875 印张 299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50 元

目 录

第一讲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地位	(1)
第二讲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和发展道路	(41)
第三讲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69)
第四讲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92)
第五讲	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 人民民主政治的建设.....	(123)
第六讲	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168)
第七讲	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201)
第八讲	统一战线的理论与策略.....	(228)
第九讲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外部环境与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	(250)
第十讲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理论.....	(282)
第十一讲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315)

附 录

毛泽东同志的读书学习和健身运动.....	徐 涛(343)
北京大学试点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 课的做法和体会.....	战 难(363)

后 记.....	(373)
----------	-------

第一讲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 及其历史地位

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它是怎样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指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1945年5至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①。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适应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需要。近现代中国的时代和社会历史环境，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中国人民斗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333—334页。

争的实践经验的积累,为它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近代中国是一个社会矛盾极其尖锐、革命基础十分深厚的国家。由于受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侵略和蹂躏,由于本国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由于在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双重压迫下国家陷于极度贫弱的状态并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实现国家的富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进行了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对于 19 世纪 40 年代至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民来说,他们所能够提出的救国方案就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已经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有效武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① 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②

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十分热烈和十分虔诚,而且是逐步深入和相当全面的。封建阶级的开明派林则徐就已经睁开眼睛看世界、注意了解西方的真实情形了。魏源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当时他们提倡的学习西方,主要是着眼于科学技术的领域。到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就不仅主张办工业、开矿藏、兴银行,而且主张“准富者请人雇工”,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出版(下同),第 1470 页。

② 同上书,第 1469 页。

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所值”，即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生产关系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则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经济领域推进到了政治领域，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启蒙思想家严复更主张系统地学习西方的思想、理论。他认为，“民智者，富强之源”，“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他通过译介西方学术名著，在中国宣传了唯物论的经验论、进化论的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和三权分立等社会政治思想。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更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说：“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他提出三民主义，是直接参照了欧美的经验的。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也不只是学习，而且还付诸行动。他们建立过团体，组织过政党；举行过变法，发动过革命。问题在于，“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太平天国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戊戌变法犹如昙花一现，仅只百日即告夭折；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起来的“民国”却是虚有其名。总之，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根本上都是以失败而告结束的。中国并没有由此变成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变成了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事实不能不激起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的怀疑，而这种怀疑也确实“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它推动人们去思考救国的新路，为人们尔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适宜的思想土壤。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正像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一样，无产阶级则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的传播，是以这个国家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为前提的。正是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

在欧洲战场上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由此壮大了起来。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60万人。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及其斗争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阶级的基础。

中国的先进分子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正当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和苦斗的时候，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与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而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表明，不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是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为自己昭示解放的道路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复述的教条。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如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中国革命仍然是不可能胜利的。

中国的先进分子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才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需要加以崇拜的信条，而是用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认识工具。因此，他们强调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这个理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拯救世界的导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星”，具有普遍的意义；一方面又指明，“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他强调，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也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当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因此，“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而“党的革命理论是要经过长期间的各种争斗才能形成的”。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应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①。

这里所说的中国实际，具体是指什么呢？首先，是指中国的基本国情，包括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毛泽东说过，认清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②；其次，主要是指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以及在这种实践的基础上所积累的经验。毛泽东说过，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它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③。实际上，正确的理论，主要是对于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再次，是指中国的历史文化。毛泽东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④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5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页。

③ 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83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调查研究中国的基本国情,科学总结人民斗争的实践经验,批判继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遗产,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

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老一辈的革命家,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等,还有许多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都作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①。

当然,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最早;与一些曾经留法、留俄等的共产党人比较,他所学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是最多;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他也没有处在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岗位之上。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中作出特别突出的贡献,以至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呢?这固然与他具有优秀的天赋、丰富的阅历、广博的才学、卓越的胆识等等有关,但最重要的,则是由于他一开始就自觉地坚持了正确的思想方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刻苦的学习精神、非凡的领悟能力,并注意联系中国实际进行思考。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下同),第352页。

毛泽东回忆说：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按：指马克思恩格斯著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①

为了掌握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他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要获得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很困难的。他曾致信中共中央，表达自己“望得书报如饥如渴”的心情，请求中央“时常寄书报”给他。1932年红军打开漳州后，他亲自去找寻书籍，运回瑞金加以研读。他说过，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长征路上，自己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其中包括《反杜林论》。到延安后，他更发愤读书。这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全面、深入的把握。

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从中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为了掌握这个理论的科学体系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以便以此为工具，去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在读书时，他总是密切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和党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思考。比如，据彭德怀回忆：1933年，毛泽东推荐自己阅读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推荐自己阅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说“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个书，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②。再如，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他在阅读《辩证唯物论教程》时，不仅在全书作了各种符号，而且联系实际写了近一万两千字的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下同），第130页。

②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183页。

批注，其中最长的批注达一千字。

正因为他完整、准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及其立场和方法，他才能以此为指导，深刻地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在理论上作出许多独创性的贡献。

其次，深入实际斗争，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

还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主张“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徐特立回忆说：他“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民主革命的思想弥漫在学校里，他着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和国内的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甫告结束，我邀他同往法国留学，他便是看到了这一点而拒绝我的邀请，他宁愿多增加一点本国的知识。”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更自觉地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而后主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接着又主管农民运动，直接领导农民斗争。大革命失败以后，他长期在农村从事根据地建设的工作和领导革命战争。他始终站在中国革命的第一线，深入实际斗争，并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向社会作调查。只有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有关问题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才能发现其中的规律性，从而找到它们的解决办法。毛泽东说过，“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据此，他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随后，他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进行社会调查，首先和着重的是进行社会经济调查。毛泽东指

出,“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①。

对于调查工作,毛泽东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以农村调查为例。他说,1925年,“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也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阳、醴陵五县”,“不过,我当时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了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和地主的问题”,认为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这种办法不行。“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所以,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②。认识农村问题是这样,认识其他问题也是这样。

从事社会调查工作的过程,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智慧的过程。毛泽东认为,到群众中去,必须有恭敬勤劳的态度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他说过,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正因为深入实际斗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在探索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作出理论上的创造,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再次,真切地了解中国历史,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第113—114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3页。

遗产。

还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今学术制度的大要”。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更自觉地把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视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项崇高任务的不可或缺的工作。他说，我们不但要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①

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他几乎无所不读。早在学生时代，他就通读过《二十四史》；后来又再次通读了全书，并写下了大量的批注。《资治通鉴》，他先后读了七遍。周恩来说过：“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②

作为革命家、思想家和战士，毛泽东了解中国的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现在和预见它的将来。他企图通过研读中国文史古籍，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中国人民；研究历代兴亡史，总结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研究治国安民的艺术；并借助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帮助中国人民建立起对于自己的民族、对于自身创造能力的信心，增强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乐观主义的信念。

毛泽东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他指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801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下同），第333页。

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①

正因为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站在当前时代的高度上回顾中国走过的历史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的分析,毛泽东就既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很少的人根本不同,也同那些信而好古、钻进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相径庭,他才能既不脱离中国的历史实际,又不囿于古人的眼界和认识,从而见前人之所未见、发前人之所未发,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深刻、独到、精辟的新见解。

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集体奋斗的基础上,主要地依靠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努力,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彻底的社会革命论就获得了在中国借以实现自己的民族形式,获得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二、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般地指明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方向,至于具体情形,实际情形,只有在千百万群众起来斗争时,他们的经验才能指示出来。毛泽东就说过:“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①

在中国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有两个特殊情况是不能被忽视的。这就是: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故乡在资本主义的欧洲。还在1919年,列宁就对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讲过:“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你们应当“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②。这些话,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是完全适用的。由于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而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这个任务的解决,就不能不遇到更大的困难,不能不经历严重的曲折,不能不有一个相当长的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经验的过程。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二大之后,就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有义务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虽然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在实际工作方面,都曾经得到过共产国际的帮助;不过,从根本上说,由一个远离各国的国际中心来指挥各国革命,这种做法本身是不可取的。实际上,共产国际的工作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中文3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79—80页。

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年代末期、30年代前期,中国党内盛行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过:“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样的口号。这种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了绝境。因此,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反对轻视理论、拒绝学习国际革命经验的经验主义,尤其要同上面所说的那种教条主义作斗争。

毛泽东思想,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调查研究中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时期。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制定的纲领,提出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最终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等一般原则,但没有指明当前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这说明,当时的党还没有学会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划分清楚。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打倒军阀”、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民主革命纲领;但也还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这说明,当时的党也还没有弄清楚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1925年1月中共四大根据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指出,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应取得领导的地位”;这个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之普遍的参加”;这个革命的基本内容,一个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这样,就划清了新旧两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第301页。

种民主革命的界限,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对这个基本思想的提出,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这个基本思想的若干方面作出过具有独创性的阐发。他从对国际环境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分析出发,指出当时阶段的中国革命既不同于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同于1911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他在对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作出有力论证的同时,着重指明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即农民同盟军问题。他还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了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指出前者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后者对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为党在后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已经初步地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萌芽的标志。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最艰苦的年代,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1927年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提出了“找着新的革命道路”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人民军队,发动了武装起义,开始了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工作也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由于更多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党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